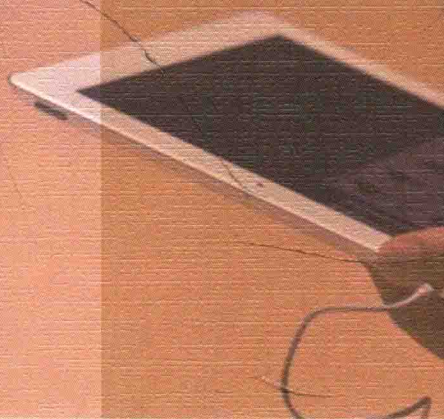


『微博问政』与党的建设创新研究

陈文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微博问政』与党的建设创新研究

陈文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微博问政”与党的建设创新研究 / 陈文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 - 7 - 5203 - 1675 - 0

I. ①微…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研究
IV. ①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486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25
插 页 2
字 数 380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一 研究背景	(1)
二 研究现状综述	(8)
三 本书的特点与价值	(31)
四 本书的框架	(36)
 第一章 微博问政概论	(41)
第一节 微博的产生和在中国的发展	(41)
一 微博的产生	(42)
二 微博在中国的发展	(44)
第二节 微博的特点与功能	(47)
一 微博的特点	(47)
二 微博的功能	(53)
第三节 微博问政的内涵与特征	(57)
一 微博问政的内涵	(58)
二 微博问政的特征	(63)
第四节 微博问政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68)
一 微博问政的发展现状	(69)
二 微博问政存在的问题	(72)
 第二章 党与微博之间的互动关系	(76)
第一节 党与微博之间的影响与合作	(77)
一 党与微博互动的社会基础	(77)

二	微博对党执政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80)
三	党的执政对微博发展的影响	(83)
第二节	党与微博关系的实质	(86)
一	微博独特的社会属性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	(86)
二	政务微博:党联系社会的桥梁和政民互动的新平台	(89)
三	党对微博的监管实质上是党对社会关系的调控	(90)
第三节	党对微博问政应有的态度	(92)
一	构建政党与微博的和谐关系	(92)
二	将微博问政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94)
第三章	微博时代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考验	(97)
第一节	微博时代党执政环境的新变化	(98)
一	微博正成为治国理政的新平台	(98)
二	微博正形成新的网络舆论环境	(101)
三	微博正成为文化建设的新阵地	(103)
四	微博正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新载体	(105)
第二节	微博时代党面临的执政风险	(107)
一	微博对执政安全的总体影响	(108)
二	微博对党执政安全的威胁与挑战	(110)
第三节	微博问政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	(116)
一	党的一项重要执政资源	(116)
二	党的建设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118)
三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迫切需要	(121)
第四章	微博问政与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	(125)
第一节	微博问政与正确权力观的树立	(126)
一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微博问政的前提要求	(126)
二	微博问政对树立正确权力观的积极影响	(129)
第二节	微博问政与民主执政	(131)
一	延伸民主执政的新路	(132)
二	推进民主执政的实践	(135)

三 加强民主执政的相应对策	(137)
第三节 微博问政与科学执政	(140)
一 彰显以人为本的科学执政观	(141)
二 促进执政理念的科学化	(144)
三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146)
第四节 微博问政与依法执政	(150)
一 与依法执政的契合性	(151)
二 对依法执政的影响	(154)
三 依法执政的发展路径	(158)
 第五章 微博问政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162)
第一节 微博问政与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	(163)
一 微博时代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概述	(163)
二 微博时代给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65)
三 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主要路径	(170)
第二节 微博问政与党应对社会舆情的能力	(173)
一 认识社会舆情演变的新态势	(174)
二 把握微博舆情的特点	(179)
三 做好微博时代的舆情引导工作	(181)
第三节 微博问政与党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187)
一 微博问政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	(187)
二 微博传播对和谐社会构建的消极影响	(190)
三 党利用微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路径	(192)
第四节 微博问政与党加强群众工作的能力	(196)
一 微博时代党群关系建设的环境及其特征	(197)
二 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99)
三 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基本思路	(203)
第五节 微博问政与建设服务型政党的能力	(207)
一 微博问政在服务型政党建设中的作用	(208)
二 微博问政在构建服务型政党中面临的诸多制约因素	(211)
三 发挥微博问政在服务型政党建设中的作用	(213)

第六章 微博问政与党的自身建设	(216)
第一节 微博问政与党内民主和党务公开	(216)
一 微博问政与党内民主建设	(217)
二 微博问政与党务公开	(224)
第二节 微博问政与党的组织建设	(234)
一 政务微博为党的组织建设带来的机遇	(234)
二 微博时代党的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	(237)
三 微博时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途径	(239)
第三节 微博问政与党的作风建设	(242)
一 微博问政为党的作风建设带来机遇	(242)
二 微博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246)
三 充分发挥微博问政的功能,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249)
第四节 微博问政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251)
一 微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正效应分析	(252)
二 微博反腐的负效应分析	(255)
三 微博反腐的路径选择	(258)
第七章 微博问政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	(263)
第一节 微博问政与公共意识的培育	(264)
一 微博是公共意识的载体	(264)
二 微博问政在构建公共意识中的角色	(266)
第二节 微博问政与公众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实现	(269)
一 微博问政与公众话语权的实现	(270)
二 微博问政与公众政治参与权的实现	(277)
第三节 微博问政与突发事件应对	(282)
一 突发事件中微博的功能作用	(283)
二 突发事件中的微博管理原则	(288)
三 突发事件中的微博应对机制	(292)
第四节 微博问政与社会管理创新	(294)
一 微博问政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扮演的角色	(295)

二 利用微博问政创新社会管理的路径	(302)
第八章 党建创新视野下微博问政的未来发展图景	(307)
第一节 加强微博问政的规制与导引	(308)
一 对微博问政进行规制的必要性	(308)
二 微博问政的规制和导引路径	(312)
第二节 吸收借鉴国外政党微博问政经验	(317)
一 微博问政在国外的产生与发展	(317)
二 国外政党微博问政的具体实施	(320)
三 国外政党微博问政的经验借鉴	(330)
第三节 提升微博问政能力,推进党建科学化	(334)
一 乘势而为,创新执政思维和提高领导方略	(334)
二 与时俱进,提高微素养和微博问政能力	(337)
三 利用微博搭建党建平台,在实践中开拓创新	(340)
参考文献	(343)
后 记	(363)

绪 论

一 研究背景

以科学技术为标准,人类的历史一般划分为石器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指出,后工业时代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体力劳动或能源,而是信息。西方媒介理论家和传播学巨匠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一书中,不仅提出了“媒介即讯息”这一影响广泛的媒介观,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准,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与运用,都宣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①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媒体已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在演进中也不断地改造着自身”^②。而“互联网的兴起,标志着媒体技术转型时刻”^③,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和普及,不仅重新刻写着人类技术的分水岭,还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媒介时代——微博时代。微博这些网络新媒体具备着政治赋权、参与、动员、斗争等功能,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社会的政治进程。“任何媒介形式的发展,或者说任何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都无法逃脱政治因素的纠缠。”^④事实上,微博不仅是

① [加拿大]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页。

② Rajesh Kumar, Devam Thapa, “Social Media as a Catalyst for Civil Society Movements in India: A Study in Dehradun City”, *New Media & Society*, 2015, Vol. 17 (8), pp. 1299-1316.

③ Michael L Mirer, Leticia Bode, “Tweeting in Defeat: How Candidates Concede and Claim Victory in 140 Characters”, *New Media Society*, 2015, Vol. 17 (3), pp. 453-469.

④ [英] 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技术、是媒体、是器物，更是意识形态，是执政资源，甚至是政治交锋与较量的场所。

当今，微博已经成为新媒体的翘楚，风靡于世界，并在全球掀起了一波“微博政治热潮”。“换句话说，作为第二代互联网，社交媒体已成为政治进程的关键部分，改变了政治功能。”^① 世界各国的政治议程也常常受到微博等社交媒体“双刃剑”效应的影响。脸谱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表示：“我们正存在于科技和社会问题的交汇点上。”在2009年前后的多国政治大选中，Twitter（推特）开始崭露头角。Twitter在摩尔多瓦和伊朗两个国家的社会抗议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让Twitter的声誉如日中天，被推至“Twitter革命”的高位，体现了微博等新媒体巨大的政治影响力。^② 正当西方国家将微博视为推动所谓“和平民主”的新利器，为其欢呼的同时，2011年以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作为煽动集结手段的英国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俄罗斯抗议活动等社会危机接连发生。自此，微博所显示出的强大政治功能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政府的重视。西方各国嗅觉灵敏的政要将微博当作竞选、宣传和推动工作的工具，“向大众传递他们的信息，说服他们的选民，并动员他们的支持者”。^③ 如在美国，微博等社交媒体网络被视作“极为重要的战略资产”。而美国总统奥巴马继承了美国政治家“新闻执政”的传统，成功地利用微博和其他社交媒体来宣传、造势、筹款，或是改变公众讨论的焦点，实现了他政治上的“精确动员”。“奥巴马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掌握社交媒体潜力的，奥巴马在选举运动中动员他的基层支持者方面尤为成功。”^④ 因此，他被誉为史上第一位“互联网总统”，2008年更是被称为美国的“Twitter年”。2011年初，就已经有60个国家元首开通了推特账号，包括

① Mehmet Zahid Sobaci, *Social Media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ory and Practice*,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p. 266.

② 2009年的伊朗大选，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借助于Twitter为代表的一些新型网络大肆散播谣言，煽动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并引发伊朗政治骚乱，这次政治危机被称为所谓的“Twitter革命”。

③ Mehmet Zahid Sobaci, *Social Media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ory and Practice*,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p. 266.

④ Kristof Jacobs, Niels Spierings, *Social Media, Parties, and Political Inequaliti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27.

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加拿大总理哈珀、巴西总统迪尔马、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南非总统祖玛等。

在中国,微博作为最便捷的社交自媒体,基于公众的广泛参与,在短短几年间,推动着中国社会舆论格局的变革。自2007年微博引入中国,尤其是2010年被媒体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以来,微博不仅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态势,而且微博问政这一新兴的网络问政形式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中国网民参与度和活跃度呈现爆炸式增长。据相关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亿,微博客用户规模约为2.71亿,其中,手机微博客用户数约为2.41亿。^①作为Web2.0时代^②迅速蹿红和标志性的工具,微博正以全新的政治传播方式,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态。当今,微博舆论成为“社情民意”的方向标。近几年来,几乎所有社会热点事件都是首先在微博上发酵,进而迅速、广泛地传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社会蓝皮书》曾经把微博评价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美国《纽约时报》2011年6月在描述中国的“微博热”时这样评论道:“微博是观察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的实时监测体系。”

微博的风生水起,不仅赋予了传统媒体新的交流魅力和舆论范式,深刻地改变了媒介景观,也给政党政治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变数。如今,“微博由于其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因而成为影响政治变化的新的社会媒体的代名词”^③。微博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媒体传播途径和信息生产、获取方式,加剧了媒介之间跨界与融合的趋势,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促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7年1月22日。

② Web2.0反映的是一种互联网的变化。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事务或一种新的技术,而是一个阶段,是促成这个阶段的各种技术和相关产品服务的一个称呼,它指代的是一个“用户中心论”,或者是“去中心论”的时代。Web2.0的本质就是媒体从个性化到个人化的发端。Web2.0与Web1.0相比,后者是以“媒介中心论”为基础的互联网应用方式,用户通过浏览器获取信息,采用的是传统的以网站对用户为主的传播方式,而前者则是以对等网络为主,媒体使用者参与传播。在web2.0环境下,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智能便捷式终端设备的更新,它使得使用新媒体的人们创建信息、组织信息和分享信息变得更加便捷和可能。

③ Jonathan Sullivan, “A tale of two microblogs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2, Vol. 34 (6), pp. 773 - 783.

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让党的领导、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联系更为紧密，也对执政党的建设和执政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微博与政治联姻，催生了“微博问政”和“政务微博热”，形成了别开生面的网络政治景观。微博问政代表着一种“开放”和“参与”的趋势，一种“亲民、高效”的工作方式，一场完善执政党领导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变革，为中国带来了社会政治变化的新动力和政治开放的新机遇，极大地推进了执政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变革以及我国民主化进程。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微博等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也给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如，微博弱化了国家信息控制能力，威胁党的意识形态安全；微博政治参与无序和膨胀等问题，影响国家政治稳定；微博监管滞后和乏力，消解政治体系的权威；微博舆论易为国际反动势力和敌对势力所操控，削弱国家主权安全等，这些都使微博易成为“危博”，给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挑战和难以预见的风险。

微博带来的这些执政风险，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是一个仍在不断发展的革命性技术，其未来发展程度及其带给人类的影响是难以预知的。对社会管理者来说，利用微博、管理微博仍属全新课题，世界各国并无很多成功经验可循。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改革中形成和积累的体制性矛盾和问题也到了集中凸显期。各种思潮交汇，各种矛盾纠缠，各类热点事件、群体事件和突发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增添了互联网的复杂性，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上，这种不安全性表现得十分明显。微博舆论主客体的多元性和公共性、舆论监督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微博本身的匿名性和易操控性等特征，使微博成为各种虚假言论、不实信息和非主流思想文化的集散场所，网络舆情变得更加复杂多变。这些负面问题加大了微博谣言和危机产生的风险，很容易打乱正常的网络和社会秩序，甚至销蚀着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另外，微博带来的媒体话语权的转移、政府话语权的流失和“把关人”角色的弱化等问题，也大大增加了党的执政风险。因此，怎样应对微博时代带来的执政风险，做好微博舆情引导工作，这是执政党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

由上可见,新媒体崛起恰逢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的独特风景。微博的出现正改变着我们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改变着社会游戏规则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改变着执政党的执政环境、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作为中国引领性舆论场,微博能否健康发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也关系着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关系着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微博问政的如火如荼,有人看到的是民众政治参与的进步和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方向,有人看到的是微博舆论的嘈杂和个人权利的过于膨胀,有人看到的是党的执政风险和国家安全。事实上,微博既不是“理想国”,也不是洪水猛兽;既不是鲜花,也不是荆棘。它只是一个不带任何价值倾向和价值诉求的开放、中性的交流工具和一个客观的信息载体。工具都是中性的平台介质,其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而关键是看“谁来使用”“如何使用”。

面对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舆论场的蓬勃发展,如果党和政府缺席或发声不够,“鸵鸟心态”或“掩耳盗铃”的架势,谈“微”色变或“敬而远之”,在舆论危机前“噤若寒蝉”或遮蔽真相,缺乏与公众之间难得的交流和互动,回应民意不够和漠视民生需求等,就很容易导致微博中“攻击政府”和“政策解释”之间的舆论对冲出现严重的失衡。舆论因缺乏引导和官方权威声音而迷失方向,各种流言和坑蒙拐骗等信息滋生传播,长期下去就会使党和政府形象受损、公信力流失,公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和好感,甚至也给部分西方媒体留下“中国政府惧怕民意”的恶意揣测的空间。毫无疑问,作为国内人气鼎沸的舆论场,微博上需要党和政府的声音。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微博及微博问政,这不仅是治国理政的需要,也是完善自我、应对微博时代执政挑战的需要。

网络管理和微博问政受到党和政府的日益重视和支持。2011年2月,胡锦涛提出“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的要求。^①2011年10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积极运用微博客服务社会经验交流会”,会上专门提出,要推动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积极运用微博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不断推进政府工作。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外宣

^① 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人民网,2011年2月20日。

办主任王晨表示,支持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运用微博,充分发挥微博客户服务社会的积极作用。^①为进一步加强微博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党员干部微博问政能力,自2011年5月以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举办的“网络问政与舆情监测高级研讨班”已在人民日报社等地持续开办。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众多高校和学术机构也将政务微博列入培训课程。在北京、浙江、广东等地,微博也成了领导干部的“必修课”。近几年,出现了政务微博形成舆论强势的局面。政务微博设置议题议程、传递方针政策、回应民意关切、引导价值共识、构建公共讨论平台,赢回了互联网上的麦克风。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再一次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提到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新高度。这些情况表明,党和政府不仅高度重视运用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听取社情民意,而且高度重视微博的建设、应用和管理,高度重视运用新媒体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

纵观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产生并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顺应了时代,始终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僵化与故步自封从来就是死路一条。当前,面对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为了实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和党确定的奋斗目标,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不断推进党建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面对微博等新媒体,党和政府应顺应和引领历史潮流,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新媒体素养,利用和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主动出击,积极开展网络问政和微博问政,走群众路线,积极发布信息,真诚交流和沟通,理性引导微博舆情,专注部门服务,努力塑造党和政府“为民、务实、清廉”形象;应充分发挥微博问政在执政为民、塑造党和国家的形象、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传播主流价值、引导社会舆情、接受舆论监督,以及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不断推进微博问政的健康发展和新时期党的建设。

总之,只有抓住时代的脉搏,才能在理想的道路上扬帆远航。

^① 王晨:《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积极运用微博》,人民网,2011年10月14日。

当今，我们的社会已经步入了信息时代，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微博作为领导干部勤政为民的桥梁和载体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进行微博问政的条件也越来越完备。正如一位西方互联网学者所言：“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换的时代——一个全新的交流时代正在代替老朽的、运转不灵的传播时代。在这个由微博推动的、正在到来的交流时代，如果我们还没能跟上它的脚步，那么就可能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①《大西洋月刊》的博主安德烈·沙利文（Andrew Sullivan）也直言道：“无论你怎么去看待微博，微博作为一个备受人尊敬的新闻媒体，其正冲击和影响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②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确立了自己作为中介传播和社会化的主要地位”，日益受到各国政党和政府的重视，“因此，我们看到政治家和政党正迁移到社会化媒体平台上”。^③

在中国，微博问政正成为执政为民、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有效工具，成为塑造执政党形象的“梳妆台”和执政者成功的“新引擎”，成为加强和创新党的建设，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要“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④因此，领导干部微博问政势在必行！而在信息化条件下，党如何积极应对微博时代的挑战，把握党务、政务媒介化的发展大趋势，如何把党建与微博联系起来，处理好党建工作、政务工作与微博等新媒体的关系，努力做到不缺位、少越位和勿错位，如何运用新媒体和微博问政创新社会管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承担好媒体执政的新角色，就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① [美] 谢尔·以色列：《微博力》，任文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② Lindsay Ems, “Twitter’s Place in the Tussle: How Old Power Struggles Play Out on a New Stag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4, Vol. 36 (5), pp. 720–731.

③ Ulrike Klinger, Jakob Svensson, “The Emergence of Network Media Logic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Theoretical Approach”, *New Media & Society*, 2015, Vol. 17 (8), pp. 1241–1257.

④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5页。

二 研究现状综述

微博问政作为新兴的网络问政的一种形式,正日益受到各国政党和政府的重视,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内外理论界关于现代传媒与政党建设的关系的研究已有相当多的成果问世,但有关微博与政府和政党关系的研究是近几年才兴起的新兴课题,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有西方研究者甚至宣称:“推特研究还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①下面就国内外微博问政和政务微博应用方面的情况作一梳理。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很早就对政党与网络媒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可以说在理论界,“把互联网用于政治目的的作用已在许多不同的语境中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审视”^②。2006年以来,以推特(Twitter)为代表的微博网站出现并迅速走红,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新宠,被广泛应用于政治传播和政治生活之中。微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外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关于微博这种新媒体的研究,国外很早就开始进行,“早期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各种日常使用服务”。^③从现今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主要集中在Web 2.0下的社交媒体研究、信息伦理研究、微博在线行为的预测、微博与社会变革研究、微博政治研究、微博在灾难中的预警研究、电子口碑研究,以及微博在商业、高等教育、健康、游戏娱乐、体育等方面的应用研究。文本分析、数据挖掘、社会网络分析、信息可视化、主题建模等是国外微博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路线与方法。微博在西方主要用于人际交往和公共关系的营造,因而,微博的个人表达功能研究、微博的社会功能研究、微博舆论生成研究、微博使用行为研究等,成为西方学者主要研究方向。而探讨微博与政党建设关系的直接研究成果却相对较少,多散见于心理学、传媒学、经济学、

① Anders Olof Larsson, Hallvard Moe, “Studying Political Microblogging: Twitter Users in the 2010 Swedish Election Campaign”, *New Media & Society*, 2011, Vol. 14 (5), pp. 729 - 747.

② Anders Olof Larsson,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Social Media Practices by Swedish Municipali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Vol. 28 (6), pp. 681 - 695.

③ Anders Olof Larsson, Hallvard Moe, “Studying Political Microblogging: Twitter Users in the 2010 Swedish Election Campaign”, *New Media & Society*, 2011, Vol. 14 (5), pp. 729 - 747.